

「空間·時間·世間」專題引言

鄒振環*

1940年代美國學者 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 所提倡的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s)，是從德文的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 發展而來，概念史主張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於以經濟觀念與其社會之間的關係出發，去掌握觀念之變化。這一史學傳統既有十九世紀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精神史的遺緒，也有現代德國哲學與社會學的特殊影響力。觀念史研究作為一種方法，在華文世界尚屬起步階段，但已可見群舟競發的局面，從與概念密切相關的「術語學」研究，到「概念史」、「觀念史」，雖然學界轟轟烈烈，同時也呈現出某種疲乏和不安。什麼是觀念史的研究，觀念史研究的範圍在哪裡，究竟哪些是屬於觀念史研究的方法？這些問題其實並未完全陳述清楚。

本刊第6期專題「空間·時間·世間」是一頗易受人質疑的選題，關於「空間」的問題的討論原屬於地理學研究、區域研究、城市和建築景觀史研究的領域；「時間」研究又多由歷史學和科學史學的研究所把持；「世間」就更複雜了，民間社會的研究、宗教與民俗研究，一般都會把「世間」理解為一種社會學或社會史的研究。本輯卻嘗試把這三個概念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組觀念史研究的專題。

空間首先是一個自然地理的概念，但空間與時間一樣，都不是固

* 作者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定和靜止的概念。空間是在時間的演變中產生，並隨著時間的演進重新結構和轉化。空間不僅僅是一個客觀、抽象的幾何概念，而是可以填充各種社會內容的社會存在，即所謂社會關係的空間形態——世間。空間、時間和世間同時也可以視為一組客觀物件與主觀感知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互相交織的文化概念。在時空演化中的世間，是一個共同地域上發生在經濟社會共同體之中的一種文化和心理感情上的認同。人世間的生命個體和社會群體，無不在先驗的時間和空間的框架下展開自身的活動，在具體的社會體驗中感知時間的推移與空間的橫互。時間、空間與世間的活動互相勾連，這三個概念不是一種靜止的存在，在近代東亞世界發展過程中，發生著地理與文化空間上的重大演變和社會震盪，以及由此促發的空間變異、空間觀念的更新。此三個概念，在複雜的社會進程中互相交織，涉及了政治、社會、城市、地景、區域變遷和文化意象等多種面向，這個進程創造了東亞社會不斷發展的空間性，創造了世間的空間—時間結構，若干新觀念和新書寫也應運而生，這是一組不可分割的觀念主題所展示的諸多面向。

本輯所選入的三篇論文屬於地景文化和城市意象史的分析，同時都涉及了與之密切的聯繫的觀念之時空化及其社會文化的變遷過程。「瀟湘」最初是一個自然實景和地景的概念，狹義的「瀟湘」，是指流經中國湖南的瀟水和湘江，「瀟湘」又可泛稱整個中國湖南。從莊子（約369-286B.C.）和屈原（352-281B.C.）開始，書寫「瀟湘」的作品都凝聚了豐富的「瀟湘文化」的底蘊。大約從唐代起，有瀟湘山水畫創作，北宋文人畫家宋迪（約1015-1080）以瀟湘的八個景致為題材，繪製《瀟湘八景圖》，成為東亞「瀟湘八景」詩畫的濫觴。這個概念在歷史的傳承和空間的衍生中，隨著人們的不同關懷而在視野上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形成了廣義的理解，衍生出在空間上的豐富意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副教授對於「瀟湘八景」這一主題如何在中國生成、影響及其被日韓接受有著深入的研究。〈瀟湘八景：東亞共同母題的文化意象〉一文處理「瀟湘八景」在東亞容受營造的

文化意象，以瀟湘八景營造了概念化、抽象化與本土化的圖視景觀，討論了其如何流傳海外，在東亞各地再生產傳播的過程。論文雖然篇幅相當精簡，但卻蘊藏了作者積久的文獻考察工夫，旁徵博引的史料與左右逢源的剪裁，都顯示作者是一位於「瀟湘」詩畫主題浸淫甚久的行家。論文從觀念史的視角切入，將一個中國古老的「瀟湘」主題，上溯五世紀沈約（441-513）的名義考訂，下探十七世紀如《海內奇觀》的旅行圖冊，用以追蹤千餘年的主題線索，探得「瀟湘八景」由自然實景而抽象化、概念化的歷程，同時也上稽十二世紀出使金國的高麗文臣、十三世紀的日本僧人、十八世紀的越南使臣等縱向600多年的時間演變，橫貫日、韓、越三個東亞國家的空間各自之容受特點及其發展的大勢，進而以詩畫抒情表現將論題進一步深化。地景是一種地理空間，帶有時間的傳承性，同時也寄託著東亞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詮釋，空間上的秩序也呼應著政治和藝術上的秩序問題，人類的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時空背景下進行，世間的活動也是由世間意識與空間意識交織建構而成，而「瀟湘」這一古老的主題正是包含著空間、時間和世間的三重因素，可謂對於本輯主題最好的揭示。

地景不僅是一種實體環境，也是人們思考世象變化、描繪地方，以及賦予世間特殊意義的結果。蘇州山塘在眾多清代士人的記述中，雖然還不屬於一個商品經濟意義上的獨立「市鎮」，但確實已是一個極適於休閒而富於逸趣的生活空間，且與虎丘並聯，構成吳中重要的遊賞之地。蘇州山塘是一條著名的「古街」，也是一個由社會、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與自然環境互動所形成的文化地景，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空間和文化意象。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馮賢亮教授的〈清代江南士民生活的空間與人文地景——以蘇州山塘為中心〉一文，以清代的蘇州閶門外山塘的書寫為基礎，從「城鄉娛樂與休閒空間的營造」、「閶門外山塘」、「人文地景的豐富與擴張」、「煙月作坊」等幾個方面，勾劃了清代該地區成為士民消閒娛樂、人文景觀的盛衰狀況，別具新意。蘇州山塘不僅是一個著名的地理空間，也是一個重

要的歷史空間和文化空間。山塘之勝景韻事，不亞於名園，其流傳之詩文也洵為珍貴的記憶，而關於「煙月作坊」的描述則又涉及民間工藝與文化生產，與文人文化另有一番互動。作者廣泛涉獵和徵引了《桐橋倚棹錄》、《清嘉錄》、《吳趨訪古錄》、地方誌等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文獻，梳理了山塘的發展歷史，呈現出清代山塘的生活情態與歷史記憶，揭示了社會變動對士人生活與山塘書寫的影響，深入地描述了「山塘」如何從世俗的地理空間轉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空間的過程，揭示出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地貌景觀、文酒詩會、日常美學極其繁盛，所映照的今日文化現狀。作者在敘述中注意空間、世變的概念，因此寫作時旨在提煉山塘的空間感與地方性，並在此基礎上，呈現出與傳統研究中對城市觀念或者說是城鄉差異感的分析所迥然不同的敘述方法，在本應屬城外鄉野之地的山塘地區，顯示自明末以來被淡化的差異感、城鄉的區分意識，城外的南濠、山塘、虎丘這些生活、文化空間被強調優於城內的感覺，絕非一種虛幻的存在，而很少有傳統時代的中國大城市，城內與城外差別顯得如此模糊。作者以豐富的資料排比，大膽地使用了地域轉移的態勢分析，強調了空間上的動態變化，使晚明以來文人士大夫對於蘇州山塘生活空間的文字記述或圖畫描繪，既反映出人們對山塘圖景轉換的不同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官、紳、民對這個獨特空間的不同感覺，展示了明代以降到清代中後期，山塘作為文化地景的一個層積、豐富的過程。

城市是一個複雜的文本，城市空間鮮少單純地因為空間本身的原因而被生產與消費，建構新的社會關係才是驅使城市空間被不斷地生產、拆除、重塑的重要動力。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張曉虹教授等三位所寫的〈城市空間的生產與消費——近代上海靜安區域的形成及其文化意象變遷〉一文，以較為紮實的資料，比較系統地討論了近代上海靜安區域的形成、重塑及其文化意象變遷的問題。作者敏感地抓住了兩大要點：一是近代上海靜安區域的形成和重塑，二是文化意象的建構與變遷。而作為上海中心城區的靜安區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區

域，其發展動因主要受兩大因素的支配，一是租界因素，二是地價因素。作者利用了自己的專業優勢，從歷史地圖或街區測繪圖的考證和分析入手，還原各個不同年代的街區空間形貌，並在歷時性的空間發展歷程中將文章所欲彰顯的時空變遷當作議題來書寫。在近代上海，靜安區域的發展與法租界中西部類似，都較之公共租界中區與法租界老區為晚。作者從「法華鎮」一路發展為「靜安區」的公共租界西區擴界過程，尤其是幾個傳統聚落的位置與道路紋理如何被公共租界內的道路、租界外的「越界築路」及電車路線等形成的路網紋理所覆蓋，將同一年代處理為進行歷史研究的基本圖，並將之後要展開的新機構、新設施或新文化地景的地點，分別標示於這些基本圖上，藉以更清楚地二次元的圖面上交代歷時性的變遷過程，如行政區劃上的變革、鄉村總會、申園、張園、愚園的位置與空間規模，乃至於幾處郊區花園宅邸如何被更易為公寓大樓等，清楚地交代了空間變化的文本，使論文的主題「文化地景」、「文化意象」得以突顯。論文點出的「申園」、「鄉村總會」、「張淑和宅邸」，即屬於頗具可看性的「文化地景」，且進一步處理了每一個空間個案背後所支持的社會功能與社會關係。「鄉村總會」和「大華飯店」的經營者作為一條主線匯出一連串的問題，並由此分頭勾勒其空間群組或相對的區位關係可以被展開的書寫故事。作者採用一個「尺度」的面向，在圖面處理的技術上予以強化，藉以說明新的都市空間形態所要支持的新社會關係。不同的街廓尺度說明了從花園洋房到公寓兩種不同的建築單體尺寸的需要，這一類對尺寸敏感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新形態」的都市空間何以會在特定的時段出現在特定的區域。都市新空間形式被生產與被消費的這一過程，往往需要藉助「放大比例尺」的過程才能讓文化的面向浮現，並讓文化地景的解析更有張力與可讀性。該文最後一段描述了1914年英法商人的資產漸漸流入華人資產精英手中，從建築外觀上可以解析的中／西形式的差異，牽引出華人中產階級要在西人為主的上流社會如何被認同和被接納的問題，較有說服力地說明了

文化消費與社會關係的生產與安置之間的對應關係。而領事館區傳達了「異國」建築情趣、大華飯店與影劇城等則影射了特定階層的社會活動與社群網路，作者梳理了領事館、休閒場所與教育機構三條線，並使之在空間中被重新編織在一起，放在華人中產階級的崛起與西人文化符碼的直接借取與挪用等敘事上，闡述出這類新形態的空間從生產到消費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在傳統城市史和景觀史的研究中，我們很少能了解城市空間「之內」和「之間」的那種複雜的互動，如何在城市的空間結構中留意其文化位置，在塊狀的空間敘述中植入線性的表述，而將城市與地景研究的時空化，該文的探索也許可以幫助城市理論的學者以新的方式去思考城市和城市意象的演變。

「觀念史」首先是作為一種方法，是一種屬於邊緣性（Marginal）的研究，目前比較成功的研究成果是出現在非中心（Uncentred）與多元性（Pluralistic）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邊緣性的特點就是沒有很固定的模式，這也是一種新研究方法吸引多種學科、多個領域學者進入和參與的原因。觀念史運用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領域已經產生了可喜的成果。觀念史研究不僅僅是把觀念作為研究的對象，也是提供一套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方法。編者比較反對觀念史研究者的自我作繭，在觀念史研究尚未在真正意義上廣泛展開之前，就規定哪些屬於觀念史範疇，哪些不屬於觀念史範疇。其實即使一些老的學科，至今都很難界定哪些研究是否屬於自己這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與觀念史研究最接近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這一領域研究界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

1960年代美國學者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40-）強調觀念之脈絡史學（contextual history of ideas），認為歷史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再現觀念本身，而在分析觀念的使用者與其外在環境的活動關係。觀念不僅在語言的脈絡中建構，也總是時間脈絡中的觀念，脈絡也總是變動的，它聯繫著空間，以及文化、宗教、制度、經濟等人世間的活動，因此也需要放在時空和世間的脈絡中去理解，從此一角度出發，三篇論文可以說是很好地展示了空間是社會的產物，也是歷史的

結果。地景和城市史的研究是一種綜合性的「混血」研究，涉及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和文化學等諸多學科，至於如何進行研究，地景和城市史的研究者需要思考，需要探索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變革。傳統的地景和城市區域史的研究，多局限在人類學和社會史的研究範圍內，城市研究所依賴文本的解釋與論證，多忽略其他具有空間或地區意識和文化意象，而觀念史方法比較強調各種文獻之空間意識和文化意象之脈絡關係的處理，或許可以使地景和城市史研究通過時空關係的演變，找到一種在新的知識和方法之背景下的對話。

從觀念史的「空間—時間—世間」角度來研究地景和城市史，目前還僅僅是一個嘗試，卻又可能有助於這些領域在研究中突破盲點，類似以往觀念史研究中一些概念，如「中心」和「邊緣」、「域內」和「域外」、「城區」和「郊野」、「社區」和「群落」、「街區」和「街景」、「移民」和「遊民」、「神聖」和「卑微」、「高雅」和「大眾」、「繁華」和「凋零」、「外部」和「內部」、「此處」和「何處」、「靜止」和「流動」、「變動」和「穩定」、「離散」和「聚合」、「意象」和「象徵」、「國族」和「家族」、「部落」和「族群」、「自我」和「他者」、「同質」和「異質」、「客觀」和「主觀」以及「公」和「私」之間等等，都可以在「空間—時間—世間」角度下，產生進一步重新詮釋的可能性。本輯的三篇主題論文所研究的自然地景到文化地景直至文化意象，從城區的變化到城市文化意象建構，都涉及到了與思想文化史相關的人文記憶、集體認同和認知意識的理解。意象如何構造和變化，如何被滲透和重新連接，城市的性格如何被重新想像和塑造等等。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來討論一種如何在時空背景下進行地景和城市史的研究，其中當然應該包括觀念史的方法。我們有必要在觀念史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社會變化和知識建構的時空界線。空間觀念擴展，意義網路的逐漸密集和交流網路的逐漸增強，會創造新的地景，會對原有的地景和城市文本，發生嶄新的聯想，同時亦可能會給觀念史的研究領域，提供一種全新的思考角度。